

一座古城 一位作家 一段历史

沈从文



凤凰之子

「美」金介甫 著 符家钦 译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I



師
子
文



鳳凰之子

「美」金介甫 著
符家欽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4

ISBN 7-80145-866-4

I. 凤… II. ①金… ②符 III. Z27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25108 号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

原 著:[美]金介甫
译 者:符家钦
责任编辑:张鹏飞
封面设计:李赛昆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宣武区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辑:100050
印 刷:北京北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5
印 数:1-3000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45-866-4
定 价:25.00 元

光明日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汪曾祺

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

五十年代初，他忽然放下写小说和散文的笔，从事文物研究，写出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大书。

他的一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他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他写过《菜园》、《新与旧》，然而人家说他不革命的。他写过《牛》、《丈夫》、《贵生》，然而人家说他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热中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写了《边城》和《长河》，人家说他写的是引入怀旧的、不真实的牧歌。他被宣称是“反动”的。一些新文学史里不提他的名字，仿佛沈从文不曾存在过。

需要有一本沈从文传，客观地介绍他的生平，他的生活和思

想,评价他的作品,现在有了一本沈从文传了,他的作者却是一个美国人,这件事本身也是离奇的。

金介甫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年轻的学者(他岁数不算太小,但是长得很年轻,单纯天真处像一个大孩子——我希望金先生不致因为我这些话而生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多次到过中国,到过湘西,多次访问了沈先生。坚持不懈,写出了这本长达几十万字的传记。他在沈从文身上所倾注的热情是美丽的,令人感动的。

从我和符家钦先生的通信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细如发,一丝不苟的翻译家,我相信这本书的译笔不但会是忠实的,并且一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我愿意为本书写一篇短序,借以表达我对金先生和符先生的感谢。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新版序

[美]金介甫

听到《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在大陆印行新版消息,我十分高兴。这本书的写成和翻译经过,可以说都算得:说来话长。1972年我开始研究沈从文,1977年写成博士论文,新版正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编成的。奇怪的是,我开始研究沈从文时,当时很少人知道沈是位作家,而我是因为对中国历史、地理感到兴趣,才研究这位作家的。即使到今天,除了湖南人外,我认为没有几个人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会感到兴趣。

在1980年之前,我没有见过沈从文。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我也怀疑能否让我见到这位作家。到了1980年,最后我终于认识到,沈从文对世界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我仍然以为,沈之所以愿意接待我,讲他的生活经历,不过是因为我对他家乡历史感兴趣。说真话,哪怕连湖南人在内,对三十年代湘西军阀混战史感兴趣、而且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我怕是惟的一个。

1980年访问沈从文时,我把研究沈的资料卡片留给了这位作家,也给了研究沈的同行凌宇和邵华强。第二年我把我的毕业论文交他们译成中文。可在当时,竟然找不到愿印这个译本的出版家,以至于到1994年中译本才得以问世。后来,我又将论文大

加修订,变成另一本新书,从而引起了中国著名翻译家符家钦的兴趣,他把新版全译本印出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尽管并不顺利,新书还是不断推出。1990年出了北京时事版,1992年出了湖南全译本版,1995年最后由台北幼狮公司出了这个最完善的版本。

其他类似的书也陆续问世。这些书分别从传记、历史,到人种学、人类学角度各有侧重。如向成国(湘西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副主任,他推出了《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刘洪涛(著有《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糜华菱(著有《沈从文年表》),他们的专著在研讨、剖析沈从文作品的深度上,是我1987年时所无法想象的。

我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历史、亲属,和他当时所处环境的研究,将使我们把研究更深入一步。同时,我也意识到,研究沈从文作品必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评估。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即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乡土方面,也不仅专供中国人研究,而要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域。我自己这份小小的贡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作品,对于重新认识沈从文著作,都将是必不可少的基石。尽管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先行者的作品,已显得陈旧,都得不断修订,创新。我惟一的希望是,所有前人写过的东西,对重新评估沈从文作品,仍然是坚固的基石。

(1999—4—15)

(符家钦 译)

引 言

记得是一九七五年，我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去搜购沈从文著作。没有料到书店店员对我说：“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等到心情平定下来后，我就猜想沈自己国家的书店店员该怎样回答我的提问，来以此自慰。想来回答是：“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是资产阶级。”或者，“他只会描写旧社会。”甚至说，“他还在信仰上帝。”当时中国的书店里买不到沈从文作品（实际上，那家唐人街书店里也是这种情况）。我知道沈在台湾倒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贵），但那里的一位图书馆管理员听说我在搜罗沈的著作，想当然地说了一句：“沈从文？他是共产党——他没有到台湾来。”我对自己说，真是一份绝妙材料，可以让鲁迅写成小说，因为鲁迅作品在台湾也遭到查禁。更有趣的是，中美关系改善以后，我终于得到机会去拜访沈从文。这时才发现每当他毫无顾忌地评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时，他不像老头儿，倒像个调皮孩子。

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尽管如此，政治因素仍然会使作家名声湮没不彰。很少汉学家能把自己的评价形诸笔墨。一位权威学者一九七二年曾当面向我推崇沈从文的成就，但到了八十年代，当讨论沈和其他作家谁能充当诺贝尔

文学奖候选人时,这位学者把当年说过的话全部收回^①。鲁迅现在之所以声名显赫,既归功于众望所归,又归功于重新评估,那么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到底占有什么地位呢?汉学家势必要考虑!他们对中国作家的评价,难道要采取双重标准吗?

本书不是文艺批评,而是一部传记。它记述沈从文的一生,他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从全面来加以考虑。但由于本书是写沈从文的第一部传记,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沈同意的一部传记^②,所以书中以较多篇幅来记述“史实”,如何评价倒在其次。沈的思想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艺术,同样,他的艺术也帮助我们阐明他的思想。不过我处理这些题目,也为了要说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的确,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我更有理由不仅向一般读者阐明我对沈从文这位作家的看法,一般读者亦无须我来饶舌,而主要是向鉴赏家表明我的观点。沈从文本人欣赏过许多作家,其中较低的有都德和法朗士,高层次的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乔伊斯。沈当然要超过前两位,虽然我还不能把他同后面几位作家并列。与我同样欣赏沈的人当然不满足于把沈从文跟莫泊桑、纪德这些二等名家相提并论。沈不像屠格涅夫那样始终一贯,也不像沈喜爱的契诃夫那样是多面手,沈只擅长写小说。可是评价一位作家只能看他的杰作。我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我还想把鲁迅同他来比一下,这不算对鲁迅不敬。如果鲁迅看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记在他的账上,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何况有些成就他也未必首肯。对沈从文评价的困难之处,除了他写过一些有毛病的作品外,还在于他写起部头较大作品来就漫不经心这个老毛病(幸亏不是一直如此)。不能忽视上层建筑的问题。因此有些评论家说沈只能算是“文体家”;的确,这位成熟的作家连一部篇幅较大

的小说也没有写完过,尽管他的《边城》很多人都认为在风格和形式上几乎可算十分完美,单是这篇经典性作品就够得上使沈从文成为伟大作家。我们不妨把《边城》跟其他孤独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比较一下。它当然比不上《红楼梦》。那么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特恩的《项狄传》,或者普罗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比比怎么样呢?我是西方人,我认为《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扎实。可是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就在我们西方世界,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的声名不是也有过几起几落吗?

事实上,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声名卓著,并不在于他写过一部不同异常的纪念碑式作品,而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广泛多样。不拘一格是沈从文的弱点,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较差作品中,他的实验对中国文学也是贡献,当时的确需要这种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本书正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应该思考历史形式主义怎样影响了文艺批评。在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鲁迅著作一直受到过分推崇,认为它体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年代的文学方向。在西方,我们可能对一首新发现的莫扎特交响曲感到兴高采烈,然而如果发现这件作品是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就会嗤之以鼻。我们自己的历史形式主义使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反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品感到亲切,所以我们习惯于现代派作家的八十年代西方读者,不容易欣赏中国现代文学,觉得作品“过时”。反过来说,正因为沈从文这样的少数作家敢于“挣开束缚”(用西方说法),对先锋派思想和技巧进行实验,那些对我们时代有偏见的人(包括我在内),才能在沈的杰

作外找到极为珍贵的“创新”。沈从文从前人手中学到先锋派思想,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感到,他可能是对“思想解放”和开拓新文艺领域感到兴趣的最后一位作家了。

似乎显得矛盾的是,沈从文对他家乡始终一往情深。一九八〇年以前他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学过外语。他的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传记,却能把中国社会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盘根错节地联结起来。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只有耳聪目明的小说家、才能塑造出本乡本土上那批令人难忘的人物。沈从文的作品也刻画出了现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甚至写出了二十世纪人物的生存处境。然而,在他那些作品中,他又以地区形象为主,提供湘西的详细情况,作为人类世界的范例。可以说,沈从文写湘西的小说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正如美国批评家考莱曾用评论福克纳作品的话来评论沈从文的作品说:“他的每部小说,不论中篇或短篇小说,所揭示的内容似乎都比他明确指出的还要多,主题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独立的作品都像是一个矿坑里开采出来的一条条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矿体的纹理和斑点^③。”

沈从文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还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④。他参加军阀的部队后,一边在湘西打仗,一边学习,同湘西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是军阀割据黑暗年代的写照。他的地区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看法在文学中赏心悦目,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令人恼火(这是他离开故土以后才认识到的),它能导致暴力反复逐步升级,最后爆发内战。可有时候在其他方法失败后,乡土感情也能在地方水平上把中国社会团结起来,防止落到氏族械斗,造成天下大乱。沈从文一面阐明这种对地区打成一片的种种方法的运用与误用,一面他使自己钟

爱的地域苏醒。作为一种气氛,他的作品隐隐约约地感到,哪怕一旦失去地区的凝聚力,就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像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从积极意义上讲,沈从文作品的基础是他对当地情况有深刻理解。他的地区并不大,他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亲戚,就是相识。因此,他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的作品在体现美国南部的政治情况显得更充分。作品并没有因为主观性而丧失了可读性,或降低了它注释历史的力量。沈没有袭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地区性的自我形象和地方色彩的陈旧写法。美国的传统南方作家写了地方风物木兰、模仿鸟、骑士神话,沈的作品中也写了艾草、龙船、巫师、侠客,沈通过这些特点把湘西描绘成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写这些风物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他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散文来创作地方色彩小说的作家。

这种写法并非完全出于想像。民国时代的湘西本来就富于乡土感情。正如它的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最适于产生浪漫的神话,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所产生的政治活动造成了一些条件,这个地区的一个抽象的社会和地理的观念正等待着在这些条件中产生。由此看来,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不但填补了湘西、也填补了更广泛的中国乡土文学和神话创作的空白。

也许沈从文这位艺术家可算过分忠于“现实”(虽然中国的评论家一般都指责他脱离现实)。只有福克纳才能描绘那幅约克纳帕塔法的地图,因为具体细节都在他的心目之中,他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下去。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却不然。他得按照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地方来创作。有时他把平素他看不起的人

也写得有声有色,寥寥勾勒几笔就使读者同情他们。正像美国作家史坦贝克写俄克拉荷马州的流动雇农一样。有时候沈也像詹姆斯·费尼·莫尔·古柏那样写他的苗族老乡,把他们写成行将衰亡而又高尚可贵的野蛮民族。如果说沈对湘西认识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也不是由于他对湘西一往情深、或者主观,而往往是因为他构思还不能摆脱羁绊。

然而照我看来,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作整个中国民族的寓言来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民族因为中国在上地位低落,已经意志消沉。跟鲁迅一样,沈从文看到祖国人民沉湎于过去显赫历史,而现在却被武器更精良、更“注重物质”的西方打败,感到苦恼。中国人想作为独立国家获得新生的希望已成为泡影,却跟南北战争后的南方佬一样,还以虚妄的“精神胜利”来自我宽慰。沈从文认为,中国人从内心反省上寻找出路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从传统意义上的古老文化中去找出路。沈从文的社会和历史观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是悲观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显得相当乐观,因为他毕竟提出了希望的根据——中华民族的新生,更确切地说,一个由多民族、多文化组成的现代化国家。

在沈从文的青年时代,大家对中国的前途还比较乐观,但到他成年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中国在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革新、新生、更新的力量一下子不断涌现,使西方人都说,这是“少年中国”时代(指戊戌维新变法以来的历次进步运动)^⑤。“少年中国”特别指从中国文人学士中成长起来的新式军人和学生,这两种人是新兴的高瞻远瞩人士的精华。而湘西则地处穷乡僻壤,在辛亥革命以前没有受过维新运动的任何影响,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思潮进入湘西要迟二十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社会进化论、地方自治计划、西方教育和军事改革一下子都传入湘西,

跟着又是文学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思想都能拯救中国;可以造就的青年人要站在前列,采用新的白话文来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沈从文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一直在宣传五四运动首创的充满希望的信息,甚至在抗日战争年代也没有离开他独立不倚的道路,尽管他在文艺同行中几乎是孤军奋战。那么,沈从文的乐观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得要追溯到他的宗教思想,或者归诸他所受的教育。沈从文不是在鄙弃中国人传统的时代里形成他的思想的激进分子,而是仍然相信中国的古老事物(不是指古老的儒家文化)能够改弦更张,为新目的服务,用不着害怕西方,也不怕社会解体。沈从文在风格题材上的中国气派,和他轻而易举及不容置疑地同化外来思想的手法,说明这位艺术家既不害怕中国向帝国主义屈服,也不担心中国在改革道路上会失魂落魄。人们从湘西的变化中可以相信,在湘西地区文化并未受到西方文化威胁,它的部族社会也没有被古老的儒家文化征服。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表达了他对中国道德和文化财富的见解。他创造了从童年时代就认识的湘西,用浪漫的和理想主义的笔调再塑造它。塑造一个少年中国形象,而不是古老的中国形象。沈从文让他的读者用新眼光来看待祖国的“传统”遗产,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一代,甚至看成是他也渴望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的先辈的热望中,看到富于朝气蓬勃的创造性活力。从正确的立场看,沈从文家乡的边区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够引来典型的青春和活力,引来超越西方文化和中国旧知识阶级的僭妄的文明力量。而且,全中国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注释

①我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和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我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少数论点之一。然而后来证明,这种论点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

②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他从不想告诉我应该怎么写。然而凡是传主认可的传记作者享有的优越条件,我一点也不缺。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后,沈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我在一九八〇年夏天,和沈单独晤谈了十二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我们曾结伴游览了香山、长城、天坛。一九八〇年冬到一九八一年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夫妇家里,又和沈谈了六回,大都是单独晤谈。一九八一年夏天沈回国后,我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老家作客。

沈老当时已到七十八岁高龄,但还能记起当年从军和后来在文艺界许多同事的姓名,记得凤凰县各处古迹,见到北京文物商店的古玩时更是如数家珍,仿佛前几天刚见过一样,当然,对五十多年前的很多往事他已记不清楚了。包括他二十年代写的某些作品。他不愿谈起早年的“不成熟”作品,采取毫不在乎的态度,使得某些史实难以澄清。例如在《记胡也频》(载《文集》第九卷四十页)中,他显然将《第二个狒狒》和《狒狒的悲哀》混为一谈,而他想谈的其实是后者的续篇,叫做《用A字记下来的事》。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种地方又不能完全归咎于健忘。尽管有这些毛病,他写起自传或别人(如丁玲、胡也频)的传记来,还是可以信赖的。直到一九八

一年,他回忆三十、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目前,在我写作本书的一九八六年,沈仍在研究中国历史,虽然一九八三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此后他只能通过口授,由沈夫人张兆和代笔,和我通信。

③见考利《福克纳简介》第十五页。

④关于中国经济地区的划分,见斯肯纳《帝国末代紫禁城》。

又见拉雷《地方与国家》和绍巴的《中国望族与政治变化:二十世纪初期的浙江省》。关于各地军阀割据形势,见纪林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卡朴的《四川与中华民国:一九一一~一九三八年的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霍尔的《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的云南地方派》、麦柯迈克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九一一~一九二八年》和萨顿的《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滇军,一九〇五~一九二五年》。研究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军阀政权的一体化,索林格曾撰写《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体化,一九四九~一九五四年》一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区特色,没有多少人研究过,只有沙费尔写过两本有趣的书,即《撒马坎的金色海滩:唐代的异域情调》和《朱雀,南方唐人图像》。至于南北朝的诗歌,更无人问津。尼维森的《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一)的生活和思想》一书倒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地区分划的某些脉络。在现代文学方面,没有人写过研究地区文学的书。一九四九年以后,只有浩然的“地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葛浩文的《黄春明农村小说》和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乡土文学》。沈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和我谈话中同意说,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在地

区特色与地方风味方面都极其贫乏。夏志清是研究地区文学的先驱,见他的《〈科尔沁旗草原〉评传》。萧乾在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给我的信中说,他认为除了东北作家群之外,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还有内蒙文学、云南文学,以及广东文学等作家群。

- ⑤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间,中国外文报刊上常常提到“少年中国”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用过了。它不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或二十世纪早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少年中国”并非这帮人自己取的名字。它泛指那些争取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进步的分子。它的另一个先例是日本本世纪初期新闻界中著名的“明治青年”运动。见鲍威尔《现代日本作家与社会》六~八页。有人把“少年中国”专指一八九八年的立宪维新党人,也指进步的、受西方基督教影响的青年。“少年中国”还指全国兴起的文化复兴运动,而限于流亡海外那批秘密活动分子,这一点跟青年意大利党类似,而不同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尽管当时中国和土耳其一样,也是个“亚洲的病夫”,所以一般指那些青年军人。在晚清末期,这种人占出洋留学生的绝大部分。但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革命党人则可以包容在内。所以,布兰德在《中国、日本与朝鲜》里乐观地把中华民族称为“少年中国”。后来,罗素的《中国问题》、福雷斯特的《中国的文学》都把参加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青年作为“少年中国”的代表。这不指五四运动中的少年中国社,它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人。赖特在《中国革命第一期: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中指出,在一九〇〇~一九一一年间,中国正在走上民族再生的过程,而后来的研究家却又指出,一九一五~一九四九年间